



我与平顶山晚报



作者：赵大民

河南鲁山人，农民，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会员，曾做过乡村代课老师。文章散见于《读者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新华每日电讯》《奔流》《草原》等报刊。

我起初写的不是这个题目，是《晚报三十年》，后来改掉了，因为全国的晚报那么多，还是直接说《平顶山晚报》好一些，读者一看就清楚了，不由得也为她欢喜了。

说得确切一些，《平顶山晚报》三十岁的生日，是2024年1月1日。

我读《平顶山晚报》的时候，她是对开的四版，且也不是自己订的，不是不愿意，而是订不起。于是，想门儿到村里的小学或村部里找，人家说：“你看了，就不用还了。”我嘴上说着“那会中”，心里却想“不还，就更得劲了”。后来，认识了鲁山县城的孙来运老师，他是做酱油醋的，却爱文化，弄文史，写散文，比做生意还用心，家里书多不说，《平顶山晚报》更是年年订、天天读，就送我不少书报，我就美不中了。

读得多了，心眼儿也开了起来，



作者：杜光松

河南平顶山人，省作协会员，单位部门主管，曾在《中国电视报》《北京青年报》等报刊上发表散文，参与编著《平顶山文化览胜》等书籍。

岁月，是心中的一条河，时而静默，时而澎湃如歌。成熟的，不是岁月，而是经历。《平顶山晚报》创刊三十年了，我和她相识相知相守，一往而情深。

1994年9月，我大学毕业来到平顶山上班。单位订有几份报纸，我最爱看《平顶山晚报》。依稀记得，那时晚报是对开八版的小报，栏目很多，版面活泼，常被同事们传阅。晚报副刊的散文，短小精悍，很有魅力，当时经常刊发书评，看得多了，我就试着投稿。那时电脑还很少，我就用稿纸写了一篇书评《文美情真不染尘》，装入信封、贴上邮票寄给报社。在忐忑不安中等待，终于在一个月后见报。虽是几百字的“豆腐块”，但我心里美滋滋的，犹如喝了蜜。

后来，电脑渐渐普及，流行起文学论坛。晚报也搞起了论坛投稿，编辑

《平顶山晚报》三十年

想着人家都能在副刊上发文章，咱试试不中？就写了一篇《丑娘》投去。一天我去村卫生所，那先生笑着说：“我读这篇文章，开始没看名字，越读越有味，心想是谁写的，一看竟是你，写哩真不赖，可中。”

拿了先生送的报纸回来，我仔细一瞅，编辑竟是张黑吞老师。我在《平顶山日报》副刊发的《背天》就是张老师编的，还发了个头题。后来，张老师又编发了我的《丑妻》，又占了大半个版面。这对一个农民来说，是有大激励的，让我在农余，就更爱读书了，以至于这习惯在以后也影响了我的儿女们，就是读好书、做好人。

1999年，我的一篇拙文获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征文一等奖，还进京领了奖，鲁山电视台录了像，陈海和孙来运两位老师写我的新闻还上了晚报。其实，我知道自己的水儿有多深，能获奖就是瞎撞瞎碰的，但上了电视，且登了晚报，心里也怪美气的。

2016年，我到一所乡村小学代课，教的是五年级语文，我上课，先给孩子们读读报刊，其中就有晚报。他们特别喜欢这个环节，说听听新闻，听听文章，这一节课一点都不累，都听到心中去了。下了课，孩子们把报纸拿过去，说听了，还想再看一遍。

2019年，我的拙文《二哥的新家》在“学习强国”上发表，晚报编辑徐老师联系我，希望有文章了投给晚报。我是个好听一听就来劲儿的人，就给

徐老师投了不少。徐老师没有烦过，把那些半成品改了，发了出来。

编辑朱老师跟我联系时，总是说：“看到赵老师的稿子，就很喜欢，还期待您的大作。”我听了，羞愧得很，别说大作了，小文也不是，况且哪儿就是老师了？今年给晚报投了一篇《他有一颗红色的心》，发出来时，标题改了，拉杂的语句也删掉了，就比原文凝练了、好读了。

晚报的编辑老师，我至今没有一个见过面的，电话或微信上，我表示感谢时，他们总说那是他们应该做的，编辑就是为读者、为作者服务的。

编辑老师没见过，我倒是在晚报记者胡耀华老师多次。他在夏天里和农民学者马超红老师来访，还掂了两个大西瓜，笑着说：“便宜，好吃。”我要切开，他却说要喝山泉水，他是晚报人，也是山里人。喷着喷着，天就黑了，他还要回城里，连汤也没有喝上。又来，却是秋老虎发威时，乡亲们的庄稼受野猪的祸害，他听我一说，就说“我去”。我说这天热哩很，您别来了，我发些图片给您。他说：“那会中？”大中午，我俩和乡亲们拱在玉米地里，他抹着汗说：“新闻跟小说不一样，不到现场可不中。”

他把我也喷到了晚报上，还不止一篇，他说：“我愿意和哥喷喷。”

人有三十而立，晚报也立得中。每一个晚报人，都在坚守一种信念、一种精神，晚报怎能不深入人心呢？

我爱着晚报，也爱着他们。

三十年未了情

老师当起版主。众多作者蜂拥而至，大家在论坛贴稿，相互评论。我写的《头等大事》《把纤绳勒进肉里》《当“白骨精”变成“齐天大圣”》等多篇文章被晚报发表，热心文友纷纷献花点赞。后来，论坛举行线下活动，我才认识百花齐放、乡村五月、小黑裙、追梦依等文友，见到了年轻靓丽的编辑老师。编辑老师很谦虚，说感谢大家投稿支持。

文学论坛衰微后，QQ、微信开始流行。副刊编辑又建立起文友QQ、微信群，继续鼓励大家投稿。每次将文章写好后，微信发给编辑老师，总会收到真诚的回复和感谢，感觉每次都是温暖的邂逅。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下，我的写作热情不断高涨，文章见报率不断提高，因而被人们称为“文人”。

那年夏天，我下班回家刚走到二楼，八十多岁的邻居刘伯忽然拉开门，拿着一张晚报，一脸笑意地说，你写得真好啊。我一看，原来当天晚报副刊登了我的文章《好人刘伯》，写的是邻居刘伯热心助人的事情。从此，刘伯一家对我们全家更加关爱照顾。

在报社领导和编辑老师的关怀下，我的散文《一生的坚守》荣获第26届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二等奖，《匍匐着，用生命拉纤》荣获河南省报刊副刊作品三等奖。由此，我才能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，被人称为“作家”。

有了晚报这个平台，我的名气也

越来越大。遇见同学朋友，对方总说又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了。领导跟别人介绍时，也会说这是我们单位的“笔杆子”。这一切都是沾了晚报的光。每次文章发表后，我都会认真阅读，发现经编辑老师修改后，不仅简洁精练，而且更准确生动，使我很受教益。

我的儿子正在读研。谈起小学时加入晚报小记者团，儿子仍留有美好回忆。那天，报社组织去宝丰酒厂采风，不让家长跟从。儿子从未独自离开我们，我们有些担心。但担心是多余的，因为报社租了一辆大巴，由专人带队负责。儿子很兴奋，回来讲了很多见闻，无形中锻炼了他的独立性。

三十年，我和晚报共成长。在晚报的提携下，我的写作水平得到历练，虽没有名篇佳作，但因为“会写”这点材料，得到领导的赏识和器重，接连调了三个单位，这对于一个农村出来的寒门子弟来说，真的是大大出乎意料。

三十年来，晚报副刊编辑换了一任又一任，尽管有的至今未曾谋面，却因为文字，因为一份报纸，都成了我的“恩人”和“贵人”。

三十年，是时间的刻度，是发展的标尺，更是奋进的脚步。三十年，情未了，爱还在。今后，我还会一如既往与晚报相伴相随，寻找更美的诗和远方。

坷垃窑焖红薯

◎薛宏新(河南原阳)

“一剪刀剪断身子，埋在土里生根子，上面长出个身子，下面生出胖儿子。”谜底是红薯。

每当我看到这个谜面，就会想起50年前的童年糗事儿。

那时，除了上学，去地里割草挣工分是我们小孩儿的主要任务。秋天，也是红薯的收获季节，我们会一边割草一边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，用小铲刀挖个圆坑，用土坷垃蛋垒个土窑焖红薯吃。

我们常把草筐放到天然渠的慢坡里，然后在头头“牙猪”叔的安排下，分工合作。先选一个人看管草筐，其他人或负责挖坑垒窑，或拾柴烧火，或到附近地里“偷”红薯。挖坑垒窑是个技术活儿，在沟壑的边沿，挖一个坑，下面留一个烧火口，上面用坷垃蛋一块一块地垒，先用稍大的土坷垃蛋，越往上用的坷垃蛋越小，如果没经验，垒一半就塌了。每次挖坑垒窑的活儿都由年龄最大的“牙猪”叔负责，一袋烟的工夫，一个像模像样的土窑就垒好了。

土窑和红薯准备好后，大伙儿围成圈，开始点火烧窑，先用干草点着，烧火的憋着气鼓起小嘴把火吹旺，再用拾来的玉米秆、干树枝烧。野地里，火就风势，越烧越旺，等烧到垒在上面的坷垃蛋变红就停火。这时，我们会把窑坑里的灰烬全扒出来，将垒在上面的土坷垃蛋抖落到坑底，然后把红薯一块一块放到土坑里，再把余下的坷垃蛋全部压在红薯上，用脚把烧红的土坷垃蛋踩碎，盖在上面，把土坑封好。

然后就是耐心地等待，我们该割草割草……过半个时辰，“牙猪”叔会招呼我们说，差不多该熟了。我们赶紧围在一起，慢慢地扒开土窑，一个个眼睛都瞪得溜圆。拿到红薯后，烫手的红薯掰成两半，一边剥皮一边吹气，待热量散尽一阵狼吞虎咽之后，再用黑乎乎的手掌一抹嘴，瞬间人人都成了花狗脸。日落，人人打着饱嗝，嘴唇乌黑，背着草筐往家赶，村里灯火渐起，不时传来大人吆喝孩子吃晚饭的声音。

今天，走在街头巷尾，仍能见到烤红薯的小推车。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买几个，以满足自己对逝去的童年时光的美好追忆和对现在富足生活的珍惜。

征文启事

日出月升，四季更迭。2024年1月1日，《平顶山晚报》将迎来30岁生日。30年，在历史中或许只是短短一瞬，但对于晚报，则是与广大读者相伴、同行、成长的不离不弃。为庆祝晚报创刊30周年，副刊推出“我与平顶山晚报”征文活动，诚邀广大读者、文友、同行分享与晚报的故事，讲述和晚报的情缘。应征作品应是未公开发表过的原创作品，以散文、随笔为主，1500字以内，晚报将择优刊发。投稿邮箱:wbfk@pdsxw.com。